

路径依赖理论研究进展评析

尹贻梅^{1,2}, 刘志高^{1,2}, 刘卫东^{1,2}

(1. 中国科学院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路径依赖已经成为理解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路径依赖理论, 明晰路径依赖的基本内涵, 总结其主要的理论贡献。本文首先分析了路径依赖研究兴起的背景以及路径依赖在技术变迁、制度变化、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应用, 然后简单介绍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内涵及理论贡献, 最后分析了路径依赖概念所存在的问题, 介绍了最新的研究进展, 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路径依赖; 路径创新; 共同演化

中图分类号: F 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50(2011)08-0001-07

一、引言

路径依赖是指经济、社会或技术等系统一旦进入某个路径(不论好坏), 就会在惯性的作用下不断自我强化, 并且锁定在这一特定路径上。路径依赖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 Paul A. David 提出的^[1], 后来经过 W. Brian Arthur^[2] 和 Douglas North 等学者的发展, 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 成为理解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3]。但是, 不同的学者和学科对路径依赖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 甚至误读了以 David、Arthur 和 North 为代表的学者所创立的经典路径依赖理论。因此, 有必要系统梳理路径依赖理论, 厘清路径依赖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及其所存在的不足。

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时间和历史在分析社会经济演化过程方面的重要作用, 认为经济系统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 有力地解释了次优选择行为成为常态的现象。同时, 路径依赖理论把收益递增机制纳入分析框架, 试图从动态角度利用知识、技术、制度、外部性等范畴来理解复杂的经济系统, 因而对一般均衡、收益递减等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挑战。尽管路径依赖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也存在一些内在缺陷, 如忽视人在塑造新路径方面的能动作用, 从而否定了内生性路径生成的可能性。另外, 无论是传统的路径依赖理论还是内生路径创新理论, 都聚焦于单一路径研究, 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多元路径依赖(multiple path dependence) 问题, 因此, 相关研究还应该关注内生性路径创新和共同演化等问题。

收稿日期: 2011-04-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技术-制度共同演化视角下的中国创新型高技术产业集群形成: 武汉和长春光谷比较研究》(编号: 41107109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大都市创意产业集群培育与发展微观机制研究——以北京为例》(编号: 20100470536);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基金项目《地理学方法研究》(编号: KZCX2-YW-345)

作者简介: 尹贻梅(1974-), 女,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

刘志高(1974-), 男,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刘卫东(1967-), 男,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二、路径依赖理论的兴起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历史转向”,主要围绕经济、制度和文化等系统到底如何变迁这个宏大命题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通过追踪经济、制度和文化等系统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转型和变化过程来理解它们的发展轨迹和动力。这一转向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强调系统过去的结构对现在的影响,也就是坚持“历史是重要的”(history matters)观点和原则。事实上,现代社会科学的创始人,无论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法国政论思想家托克维尔,还是19世纪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创新系统研究的重要开拓者熊彼特,都是运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问题(Mahoney和Rueschemeyer, 2003)。熊彼特曾经明确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那么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但是,历史主义研究通常关注“宏大的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再加上自己又没有形成一套可操作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研究者往往容易陷入浩瀚的历史文献海洋而不得要领^[4]。可惜,坚持“历史重要”原则的这一宝贵的学术传统在“二战”后被长期遗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路径依赖”、“过程”和“动态”等为标题的文献才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历史主义传统才开始复兴。当前社会科学出现的历史转向与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复兴以及计算机科学、复杂科学、热力学等取得长足的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5]。由于路径依赖深刻、形象地揭示了“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过去”这一规律,亦即“历史是起作用的”,使得“时间不可逆”、“历史不能假定”等概念深入人心,因而成了社会科学家通过历史理解经济和社会现状与变化的重要范式,也是当前历史主义和演化主义分析的重要范式。

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其他概念一样,路径依赖也是由生物学家最早提出和使用的。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古生物学家Eldredge和Gould(1972)在研究物种绝灭问题时发现物种进化往往是以跳跃方式而不是渐变方式进行的,偶然的随机突变因素会影响物种进化路径,并明确提出了“路径依赖”概念。美国经济史学家David(1985)^[1]首先把路径依赖概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并且用它来研究技术变迁问题。后来经过Arthur和North等学者的发展,路径依赖成为理解历史重要性的重要概念^[2]。David(1985)本人把这一概念运用于技术变迁研究^[1],他在解释现在被广泛采用的QWERTY键盘是怎样变成标准键盘时指出,QWERTY键盘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它最早,并且把这种现象称为“路径依赖”^[1]。David的路径依赖理论有力地揭示了技术次优解决方案选择行为成为常态的现象,并且解释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David(1985)提出了三种共同导致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现象的机制,即技术相关性(technical interrelatedness)、投资准不可逆性(quasi-irreversibility)和正外部性或规模报酬递增。美国圣达菲研究所教授Arthur(1989和1994)系统发展了路径依赖思想,并且阐明了技术演进过程具有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性质的观点,探讨了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他指出,技术通过“用中学”、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适应性预期等四种机制来实现报酬递增。除了打字机键盘以外,学者们还发现了许多占据重要市场份额的次优技术,如现代铁路轨道的标准间距被锁定在古罗马军队战车的宽度(4.85英尺)上,而这正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另外一个著名的技术路径依赖案例就是录像机技术被锁定在VHS制式上。虽然VHS制式录像机并没有Beta制式的图像清晰,但由于VHS抢先占领了市场,因此,VHS制式录像机占据了绝对大的市场份额。同理,微软操作系统抢先占据了市场,所以,是微软公司而不是苹果公司垄断了操作系统市场。

三、路径依赖研究的扩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路径依赖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制度变迁、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North(1990)^[6]首先把路径依赖概念应用于制度变迁研究的先河。为了分析“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绩效极差的经济仍能生存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

North(1990)^[6]率先把路径依赖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并且建立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North比较研究了英国与西班牙、北美与南美不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认为是偶然因素、制度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等自我强化机制决定了制度选择和路径变迁的多样性,同时也导致大量低绩效或无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后来, North、Campell、Hausner、Federowicz和 Vincensini等学者从生物进化的视角解释了制度路径依赖的不同机制。Hausner、Jesso和 Nielsen(1995)^[7]等学者开创了路径依赖的转型经济学分析,认为外部偶然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建立;而后,由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同效应、正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学习和适应性效应等产生的制度递增收益,导致计划经济这种低绩效经济制度得以长期存在,而未被高绩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比较重要的应用领域还有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近年来,学者们日益认识到“路径依赖是一种社会认知现象”^[8]。有学者(如 Metcalfe, 1998^[9];曹瑄玮、席西民和陈雪梅, 2008^[10])指出,技术的路径依赖性不仅仅源自于技术的相互依存性,而且还与相关的行为惯例、社会关系及认知结构有关,因此应该从认知结构等微观层次探讨路径依赖的社会性构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结合认知局限性研究,已经成为当前路径依赖理论跨学科研究的一大重要趋势。例如,包括 North(2005)在内的许多学者已经开始把心理学认知结构引入制度变迁研究,并认为环境、历史遗存等因素决定人的智力结构。因此,智力结构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也是约束社会短期与长期演进选择集合的重要因素。同样, Pierson(2000)^[11]和 Mahoney(2000)^[12]认为路径依赖有助于解释制度的涌现、制度的持续和制度的变革等问题,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对现在和未来发展都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路径依赖的程度进行探讨。Leibowitz和 Margolis(1999)^[13]根据依赖强度,对效率进行了动态化处理,把路径依赖分为三个等级:一级路径依赖是指路径依赖由决策的持久性导致的,与效率无关,人们必须花费成本才能离开最初选择的路径,这种路径不一定是唯一最优的,但却是最有效的;二级路径依赖是指在没有掌握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所选路径存在缺陷(如与将来的环境不匹配),但要改变它,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三级路径依赖是指尽管掌握了关于无效选择的准确信息,但由于无法集体协调选择更有效率的替代物,结果仍然采用缺乏效率的技术或制度。类似地, Roe(1996)^[14]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路径依赖:一是低度路径依赖,如一个社会在两种制度之间做出选择,就效率而言,被选中的制度和被舍弃的制度相差无几;二是中度路径依赖,随着环境的变化,更具效率的新制度已经出现,但由于旧制度实施已久,重建新制度不经济;三是高度路径依赖,改变现在的路径将获得明显的高效率,但是,这种改变却没有发生,原因通常是公共选择失败或信息传递机制存在缺陷。不过, David(2001)^[15]认为,路径依赖是一种随机动态过程,它严格屈从于历史偶发事件的支配。这种支配的强弱并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没有分叉过程的占优概率分布所决定的,因此,这一过程不存在所谓的“路径等级性”。于是, David(2001)^[15]将路径依赖分为“积极的路径依赖”和“消极的路径依赖”。积极的路径依赖是一种随机动态过程,它是这一过程自身的历史渐进分布的结果;而消极的路径依赖是一种非历史过程,因而不能摆脱历史的约束,从而导致路径依赖的产生。

四、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贡献

(一) 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内涵

尽管不同学科或不同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也形成了一些共识^[12],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路径依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前者是指路径依赖是一种“锁定”(lock-in)状态,如现在的社会经济等系统的结构和形成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锁定在过去的结构和路径上,这种锁定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而后者是指路径依赖是一种非遍历性随机动态过程,

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遵守不可逆定律,发展方向不可能回到先前的结构和形态,同时也是非线性的,如社会经济演化路径不可能渐进收敛于某种单一格局,而是存在多重可能性。其次,早期的偶然历史事件对系统的发展轨迹产生一定的影响。路径依赖理论常用于因果过程研究,并认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并且为随机过程所影响,发展轨迹往往由小事件触发,最初不起眼的差异发展到最后会呈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路径依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由一个个事件序列构成的自增强过程,早期细微的差别很容易导致后期发展路径和绩效的巨大差异。最后,路径依赖强调系统变迁中的时间因素和历史的“滞后”作用。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系统便陷入锁定状态,即出现报酬递增、正反馈、自增强现象。历史的“滞后”作用既可能是历史事件的结果造成的,也可能是历史本身内在的性质(内在的规则和秩序)造成的。但一旦临界值达到一定的水平,在累积和自增强过程的作用下,系统就会被锁定在某些状态而很难脱离现有的发展轨迹,进入更有效的可替代轨迹。

(二) 路径依赖理论的贡献

路径依赖理论在经过了 David、Arthur 和 North 等学者的系统发展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并在技术变迁、制度演进和其他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无疑应该归功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部门(knowledge-based economy),如高科技部门,日益取代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部门(resource-based economy),如农业、矿业、传统工业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路径依赖及其相关理论强调报酬递增,因此对于新经济部门更具解释力。其次,路径依赖理论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革命性冲击,它挑战的不仅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本身,而且还包括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因而被认为是经济学范式的全新再造,动摇了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理念和基本方法。

路径依赖理论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路径依赖理论追求对历史变迁动态过程的理解,对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挑战。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基石之一(另外两个是价格机制和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由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在1874年提出的,后来又得到了帕累托(Pareto)、希克斯(Hicks)、诺伊曼(Neumann)、萨缪尔森(Samuelson)、阿罗(Arrow)、德布鲁(Debreu)、麦肯齐(McKenzie)等经济学家的拓展和完善。该理论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以微积分为分析工具,研究经济系统中存在的以价格体系为基础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与稳定性。边际收益递减假设意味着竞争均衡只有一个收敛点,而不存在多重均衡;同时,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微积分无法处理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系统的非线性,因此,传统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静止的线性世界。而路径依赖理论则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试图通过纳入时间维度来体现历史演变的不可逆性,并通过引入制度、心理认知等范畴来体现社会系统的非线性;同时,路径依赖理论放宽了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引入报酬递增概念,就意味着竞争均衡的收敛点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因此放弃了均衡分析的方法(贾根良,1998)。

第二,路径依赖理论坚持报酬递增原则,动摇了传统经济学奉行的收益递减规律。一方面,如上所述,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传统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对象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部门,而这些经济部门确实是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体系为了使函数极值、收敛性、均衡点存在,就必须假设生产函数的严格凸性和消费函数的严格拟凹性,这种假设直接排除了收益递增的可能^[16],尽管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收益递增问题,但这一思想只是马歇尔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个“例外”。事实上,路径依赖理论认为收益递增是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基本特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技术水平必然会发生改变,因而否定了原有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中的“技术水平不变”这一先决假设条件。在理论上,路径依赖理论通过分析“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把收益递增机制纳入分析框架,试图从动态视角利用知识、技术、制度、外部性等范畴来理解复杂的经济系统。

第三,路径依赖理论揭示了偶然因素的重要性,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决定论假设。传统经济学假定

经济中不存在不确定因素,也不存在虚假交易,所有的交易必定能通过预期修正、行为调整来达到效率最优的必然世界,而且都是在市场均衡价格形成时达成的。而在收益递增的系统中,由于可能存在多重均衡,经济过程中偶发的微小历史事件有可能无限放大它们的影响,路径选择结果对它们的依赖也变得更加敏感。这里所说的历史事件,包括在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引发的环境变化。同时,路径依赖理论强调不同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秩序不会产生唯一的均衡结果;初始条件差异决定发展路径和发展绩效差异。但是,由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偶然的,无法预测,容易让人陷入“不可知论”和“悲观论”的陷阱,因此,路径依赖理论也招来了许多批评。于是,如何打破“锁定”状态,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有效避免陷入恶性路径依赖,就成为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五、路径依赖概念所存在的问题与相关研究的新发展方向

(一) 路径依赖概念所存在的问题

虽然路径依赖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受欢迎,但也遭遇了一些批评,其中主要有三点。首先,现有的路径依赖研究大多把一个经过简单处理的路径依赖概念等同于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是重要的”观点。事实上,大量的路径依赖研究者误读了 David 的本意,当初 David 引入路径依赖概念是试图强调技术本身的历史对技术变迁路径的影响,但不能本末倒置地把“路径依赖”理解为“历史是重要的”。事实上,“历史是重要的”观点比路径依赖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事物的变化与发展路径不仅受到事物自身发展历史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

其次,经典的路径依赖理论排除了内生性路径生成的可能性。尽管以 David 和 Arthur 为代表的经典路径依赖理论倡导者承认路径变化的可能性,但都把路径突破的动力仅仅归结为外来冲击^[8,17]。这意味着传统的路径依赖模型没有给熊彼特式创新在路径变迁过程中留下任何空间。在经典的路径依赖模型中,路径的发展是一个受历史因素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偶然事件对路径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该模型没有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路径变迁是一个突现过程。同时,由于路径依赖思想更多被用来分析过去对现在的约束,而不是研究对路径依赖的破解,从而导致这种思想缺乏面向未来的实际应用价值。

最后,尽管路径依赖概念承认历史的重要性,但是,早期的路径依赖研究并没有辨识历史重要的程度。事实上,历史并非永远都是重要的,至少并非一直都重要,因此,辨识历史的重要程度十分必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历史的重要性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些批评毫无疑问与路径依赖理论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有关系。由于不同的学者不是把历史看成是抽象的,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具体的。在具体的经验和案例研究中,一种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把历史看作是具体的,也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所带来的结果,只有这样才可以具体地分析历史事件,而不是抽象的历史影响程度。

(二) 路径研究的新发展方向

1. 路径创新研究。经典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只有受到外部冲击,才会导致路径偏离以往轨道而实现路径突破,但忽略了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最近有学者^[17]呼吁加强内生性路径创新研究。其实,路径创新研究可以追溯到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思想。Garud 和 Karnøe(2001)明确提出了“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概念,并指出路径创造不仅需要外部环境和恰当的时机,更需要企业家集体创造性地整合各种资源和进行集体学习,以实现发展思路的分叉(mindful deviation)。后来,Pham(2006)^[18]发展了路径创新思想,并提出了路径创新的五条准则,即技术决定准则(现有的技术是创造新路径的基础)、有意识偏离准则(企业家是路径的真正创造者)、实时影响准则(企业家的行为对路径产生实时的影响)、相互依存准则(企业家和员工必须互动)、最小误解准则(企业家通过决定信息分享者和分享程度对路径进行充分的控制)。这五条准则明确了路径形成的基础、面临的困难、行为主体影响路径的方式以及创

造路径的行为主体应该具备的特质。Sydow 等(2005)^[19]则提出了“路径构造”(path constitution)概念,并把路径构造分为路径产生、路径持续和路径终止三个阶段。他们认为,这三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路径自然产生与参与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辩证统一。路径产生不止是一个偶然过程,而且也是参与者追求创新目标、为实现创新目标而持续奋斗的过程。Sydow 等把 David 和 Arthur 提出的路径依赖概念变成了路径持续(path persistence),并且把基于企业家意愿的路径持续过程称为“路径延伸”(path extension)。关于路径如何终止这个问题,Sydow 等的观点不同于经典路径依赖论者认为“只有外部冲击才会导致路径发生变化”的观点,他们认为路径终止有可能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非计划性路径消失(path dissolution),二是由于人为原因而在原有路径的基础上有意创造新的路径分支,即所谓的“路径偏离”(path deviation)。

2. 共同演化研究。无论是经典的路径依赖理论还是内生性路径创新理论,都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单一路径研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多重相关路径依赖现象。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境下,本地自强化的技术变革、经济结构和政企关系、商业习惯等制度形式,都将成为本地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重要来源,并且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即多重相关路径存在相互依存关系^[17,20]。锁定在单一路径上最终会导致衰退,而新的危机的出现又会孕育新的发展机遇,并且开始新一轮的路径依赖轮回。由此可见,路径依赖过程中导致路径依赖强化的因素,同时也可能是导致最后路径依赖突破的因素。对路径依赖和相应的路径转化的分析,应该坚持共同演化的观点(刘志高和王缉慈,2008)。共同演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涌现的种群之间互为因果、相互适应的关系。但是,当且仅当两个种群之间持续存在重大的因果关系时,才会存在共同演化关系(Murmann,2003)。Murmann(2003)以德国为例讨论了国家层面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问题。德国印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教育制度和专利法的改革,尤其是大学实验室的建立又加强了企业与有机化学研究机构的联系,正是这种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奠定了德国合成染料业的国际地位。尽管共同演化研究在社会文化、组织战略和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刘志高和王缉慈,2008),但大多属于理论研究,案例和经验研究十分罕见。此外,现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因此,未来应该加强共同演化的经验研究,特别应该加强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产业与制度问题的经验研究(刘志高和王缉慈,2008;Schamp,2009^[20])。

六、小 结

上述分析表明,路径依赖理论已经成为理解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重要理论。路径依赖概念追求对历史变迁动态过程的理解,试图通过研究技术、制度本身的历史来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规律,强调时间和历史在分析社会经济演化方面的重要性,并且认为时间决定结果,事件发生的时间决定其发生过程,强调早期的偶然历史事件对系统发展的轨迹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关研究得出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敏感地依赖初始条件的结论,有力地解释了次优选择行为成为常态的现象。同时,路径依赖理论把收益递增机制引入分析框架,试图从动态视角运用知识、技术、制度、外部性等范畴来理解复杂的经济系统。因此,路径分析方法克服了传统经济学中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线性与非线性、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无法有机整合的弊端,规范了分析社会随机动态系统的方法,对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思想提出了挑战,并且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收益递减原则,坚持认为不确定性和多重均衡的存在性。

路径依赖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受欢迎,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首先,该理论把一个经过简单处理的路径依赖概念等同于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是重要的”观点,把复杂的社会经济历史演化简单地理解为单一的要害和系统的历史过程,忽略了其他要素和系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路径依赖理论忽视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把路径的建立看成是随机事件,并且认为行为主体在整个路径发展变迁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实际上,技术、组织或者制度的突变经

常是行为主体采取有目的的行为的结果,而不是随机和偶然事件的产物。因此,很多学者批评路径依赖理论忽略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创建新的路径方面的作用,从而排除了内生性路径生成的可能性。另外,路径依赖理论尽管承认了历史的重要性,但没有定量测算历史重要的程度。针对路径依赖概念所存在的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应该加强内生性路径创新研究。但是,无论是传统的路径依赖理论还是内生性路径创新理论,都仅聚焦于单一路径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存在多重相关路径依赖问题,因此,今后有必要加强制度与技术等方面的共同演化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 [1] David, P. A.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2): 332- 337.
- [2]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3): 116 - 131.
- [3] Martin, R. L, and Sunley, P. J. The place of path dependence i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landscape[A]. in Boschma, R, and Martin, R. L(Eds.). *Compendium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C]. Chichester, UK: Edward Elgar, 2010: 62- 92.
- [4] 高德步. 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8, (5): 1- 6.
- [5] Liu, Z. The emergence of clusters in societal transition[D]. Frankfurt University, 2009.
- [6] 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 Hausner, J, Jesso, B, and Nielsen, K. Strategic choice and path-dependency in post-socialism: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M].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5.
- [8] Garud, R, and Rappa, M. A. 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 case of cochlear implant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3): 344- 362.
- [9] Metcalfe, J. 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10] 曹瑄玮, 席酉民, 陈雪莲. 路径依赖研究综述[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 (3): 185- 191.
- [11] Pierson, P.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2): 251 - 267.
- [12] Mahoney, J.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J]. *Theory and Society*, 2000, 29(4): 507- 548.
- [13] Liebowitz, S. J, and Margolis, S. E. *Winners, losers & Microsoft: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in high technology*[M]. Oakland, CA: Independent Institute, 1999.
- [14] Roe, M. J. Chaos and evolution in law and economics[J]. *Harvard Law Review*, 1996, 109(3): 641- 668.
- [15] David, P. A. Path dependence, its critics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A]. in Garrouste, P, and Ioannides, S(Eds.). *Evolu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in economic ideas: Past and present*[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1.
- [16] 刘元春. 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J]. *教学与研究*, 1999, (1): 43- 49.
- [17] Martin, R, and Sunley, P.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4): 395 - 437.
- [18] Pham, X. Five principles of path creation[J]. *Oeconomicus*, 2006, 8(1): 5- 17.
- [19] Sydow, J, Windeler, A, Lering G, et al. Path-creating networks: The role of consortia in processes of path extension and creation [R]. *Path Dependence and Creation Processes in the Emergence of Markets, Techn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21st EGOS Colloquium, June 30- July 2, 2005, Berlin.
- [20] Schamp, E. W. On the notion of co-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A]. in Boschma, R, and Martin, R. L(Eds.).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C]. Chichester, UK: Edward Elgar, 2009: 423- 429.

(责任编辑: 谷 化)